

中国改革家历史长

王安石

王丕震历史实战小说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中国改革家历史长卷

王安石

王丕震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吕 泰

封面设计：主题工作室

版面设计：邓小林

责任校对：程 诺 刘 平

责任印制：徐 辉

书名 中国改革家历史长卷·王安石 定 价 19.50 元

作者 王丕震 ISBN7—5411—1710—2/I·1498

1998 年 9 月 第一版 199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数 1—5000 册

印张 14.25 字数 332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都江堰九欣彩印厂印刷

变革风云 历史实战

——编者前言

把历史比喻为长江大河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江河奔流，有曲折有回环，有跌宕有波澜，但连绵不绝，久远永续。这很像人类社会的发展，有前进也有倒退，有陈腐也有更新。而每一次革新变法，无论成功抑或失败，总是充满矛盾冲突，掀起惊涛骇浪。尤其令人警醒的是，历史的每一次腾跃，都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改革家个人的巨大悲剧。如中国历史上最早最著名的“商鞅变法”，就促成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霸业而言，功盖千古，而改革家本人，却落得车裂惨死的结局。这，自然是封建旧体制使然。当然更足令后人深长思之。

日月经天，时光飞转，二十世纪末的虎年之春，一声“朱镕基洒泪为商鞅”，震动中国人的心，也促使和激励我们推出这一套《中国改革家历史长卷》丛书，既为功不可没的志士英杰树碑立传，也让世人了解历来变革之险阻艰难。进而让我们从历史的镜鉴中，增强在新形势下推进前无古人、泽被后世的改革大业的决心和勇气。

老作家王丕震先生已年过花甲，早年从军艺农而情钟文史，自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后，即潜心读书，神交古人。1981年获平反退休后，便闭门谢客，专意创作。由于国学功底深厚，八十年代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一部历史长篇《则天女皇》就一炮打响，初版即印发10万余册，畅销全国。

此后一发而不可收，十余年伏案笔耕不辍，已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历史长篇小说数十部，产量惊人，风格独特，享誉海内外，被称为“文坛奇人”。其被海外称为“历史实战小说”的写作手法，不拘一格，自成一家，采用民间叙事方式，将遥远古人推到今人眼前，将神秘宫廷从天上拉回地面，将被戏剧化的历史还原人间，惊心动魄凝于不动声色的描叙中，常收“于无声处起惊雷”之效，让我们如晤其人，如临其境，更真实更贴近地领略历史风云变幻的本来面目。这与由来已久的总是将历史人物，尤其是帝王将相套上戏装，说戏文道白的历史小说写法，当是另一种风味。一如海外评论家所言：“其历史人物的描写，完全以小说的方式呈现，让古人的风范、智慧的结晶、行为处世的思路跃然于纸上。尤其它的内容是以‘全新视野，实用导向’为出发点，探索历史经验，以古人为史，拜历史为友，叙述历史成败的关键，何以为王，何以成寇。其小说情节紧凑，扣人心弦，文笔之间洋溢着独特的文采。”我们郑重推出这一套“历史实战”长卷，敬请广大读者品鉴。

林文询

1998年夏于蓉

目 录

一	神宗初登.....	(1)
二	曾巩荐才.....	(23)
三	安石上京.....	(47)
四	郊天峥嵘.....	(70)
五	奇人破天.....	(92)
六	始行变法.....	(115)
七	百般阻挠.....	(137)
八	游鱼可数.....	(160)
九	诸葛惠卿.....	(181)
十	强堰青苗.....	(203)
十一	南柯一梦.....	(226)
十二	大义灭亲.....	(249)
十三	弘羊之才.....	(272)
十四	平民治水.....	(294)
十五	明争暗斗.....	(316)
十六	恶霸皇亲.....	(339)
十七	日蚀食法.....	(361)
十八	罪己恶诏.....	(383)
十九	宋辽界争.....	(405)
二十	帝崩臣死.....	(428)

由于英宗的病逐渐加重，当然满朝文武就要关心到皇帝驾崩的事情。一旦皇帝死了，谁嗣位呢？英宗春秋正富，万没料到自己即位才三年就会在健康上出问题，所以至今没有立太子。没有太子，在封建王朝里，是一个最大的乱源。皇帝死了没有太子嗣位，几个皇子就要出来争位。皇子年轻，皇弟也会出来争位。反正不想当皇帝的人，几乎可以说没有，尤其是宋朝，经历过极不光彩的事——开国皇帝宋太祖死后，没有把皇位交给儿子，而由兄弟夺去了，就是历史上的宋太宗。一般皇位的继承，外姓大臣是无权过问的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立太子。不论这个太子才德好不好，只要由皇帝所立，哪管他是什么人，都只能绝对服从。而朝廷的大臣，在皇帝生病这种紧要关头，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。韩琦和文彦博就是来办这件事的。但这事也不大好办，你直接向生病的皇帝提出这个问题，仿佛就是宣布他快要死了，这对皇帝的病情极为不利；但不忍开口，万一皇帝未立太子就死了，又是不得了的事情。韩琦就站起来奏说：“陛下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上朝，内外都感到惶恐忧虑，最好把太子立了，以安定人心。”

英宗听了，止不住哭泣，滚下几滴泪来，弄得韩琦和文彦博也不知怎么好。最后，英宗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。韩琦就对内侍高居简说：“你把文房四宝捧了来。”

高居简捧来纸笔墨砚，韩琦接过，递给英宗。英宗接过笔，写了“立大王为皇太子”七个字。韩琦接过来一看，知道指的是英宗的大儿子赵顼。这无疑已是遗命了，但没有写个确切的字，总觉得不好，就又奏说：“陛下指的是颍王了，但请把名字写下。”

英宗又接过笔，加批了“颍王顼”三字。韩琦说：“请陛下今晚就请学士草制。”

英宗又点了点头，就诏学士承旨张方平到御前授命，退出草制。第二天早上，立颖王赵顼为太子。文彦博对韩琦说：“昨天你见圣上这种表情有何感受？人生走到这一步，也算伤情了。”

韩琦说：“国家大事，不能不这样办。这时心头一软，未来就不好补救了。”

治平四年元旦那天，文武百官要给英宗上尊号，按礼应该在辰时入朝庆贺。到福宁殿，英宗没有出来，文武百官只好对着空座舞蹈一番，表示对君王的忠心，就依次退出来。但见外面朔风怒号，阴霾四塞，大臣们都觉得天象告变，主征不祥。过了七天，英宗病危，几个重臣都赶到福宁殿去。当时，皇太子没有到，英宗就落气了。就急召太子，太子还没有来到，只见英宗的手又动起来。宰相曾公亮见了，吓了一跳，忙对韩琦说：“圣上又动起来了，莫忙召太子。”

韩琦说：“如果活转来，当太上皇好了。快召太子！”

就急派人去召太子。宫里发出讣告，英宗已经归天了，寿三十六岁，在位四年。

这时候，宋朝的国库不怎么样充裕，人口增加，官员也增多；加上仁宗很会花钱，整天耽于酒色，又喜欢赏赐，而收入只是那点常数。英宗接事后，财政上就已经沟通底漏。所以，群臣在商讨丧事时，御史刘庠说：“按礼节规定，办丧事不能饮酒吃肉，但仁宗死时，百官和各军朝上都给酒肉，京城的羊都杀光了。这一回，请求百官吃素。”

韩琦说：“有个祖宗法度摆在那里，仁宗死都给吃，为什么这一次就不给呢？”

刘庠说：“要问为什么，就是没钱。这不是少量钱能解决的。”

韩琦说：“为什么上一次有钱，这一次就没有？先帝也不很破费，国家又没有战事，钱往哪儿去了？”

刘庠说：“其实这事该由我问相公，为什么当宰相的反问言官呢？”

韩琦说：“祖宗法度不能变，酒肉还是要给。”

刘庠说：“既是要给就要到外地调羊，等把羊调回来，再办丧事。”

曾公亮说：“从实际情况出发，我说把酒肉免了。”

韩琦问：“你依据什么？”

曾公亮说：“我依据实况：第一，朝廷国库不足，开支不了；其次，京都无羊，难以供应。如果等把羊调齐再办丧事，时间等不了；再说，上一次给酒肉，也只是京都，难道说皇帝只是开封府的皇帝，而不是全国的？为什么只给京都的军人吃而不给各路的兵和民？一概不给，较为合理。”

韩琦说：“吃不吃酒肉是小事，遵不遵祖宗法度是大事。我当宰相要坚持旧制，上一次给吃合不合理我不管，那不是我订的，只是我一定要遵制办理。”

曾公亮虽然也是宰相，但韩琦一意卖老资格，好像他才是真宰相似的。曾公亮又问：“百姓给不给呢？”

刘庠说：“百姓不给。过年还不满十天，吃了那么多肉，再吃还了得？”

韩琦说：“你御史只能谏议，没有决定权。你怎敢说不给？上次给了，这次也要给，吃得动吃不动是百姓的事，给与不给，也与你无关！”

这事还没有扯完，枢密使文彦博说：“吃不吃酒肉，按仁宗例办好了，这不是大事。现在要讦告中外，辽国的母后应该怎样称呼？是不是我们皇帝自称侄孙，而称母后为大母？”

这是宋朝的痛处——一味因循守旧，重空谈而不习武，苟安偷生，向小小辽邦称侄也不以为耻。现在皇帝死了，要下讣告，作为军事首长的文彦博大言不惭地问怎么称呼，一些有点良心的臣子，都低下头了，只有太常寺李东之和刘敏求等，可能是涉及了他们的职责范围吧，答说：“我们应该自称侄孙，而对母后称为叔祖母，才合辈分。”

别的人再也没有说什么了。

太子右庶子韩维说：“我听说先帝死后有遗物，应该分给臣下，但承平日久，国用匮乏，四年间死了两个皇帝，造陵和赏士卒，就要花很大一笔钱。如果按照仁宗旧例，恐怕行不通。我的意见是拿出一些衣物和玩物来表示一下，爱惜金帛，以救当世之急才行。”

三司使韩绛说：“祖宗平定天下，收敛天下金帛藏在库里，遗留给后辈的实在太多了。但康定庆历以来，把所有积存都拿出来花了，现在百年之积，只剩下一本空簿子。我说文武百官来个例行的添官加职，不能再重赏金帛了。”

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说：“财政的匮乏是很严重的，不能认为小省无益而不为；也不能小费无伤而放手乱花。要从长远打算，减轻人民负担是当务之急，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”

这场议论，所言不虚，可以看出当时赵宋朝廷的真实情况。国用匮乏，死个皇帝要破费的财物，都已感到开支不了啦！而对辽邦要喊叔祖母也只好隐忍而行。如此可悲，仍安于现状，听不到一丝儿新的声音。

皇太子赵顼即皇帝位，称为神宗。诏告中外，尊皇太后曹氏为太皇太后，高氏为皇太后，晋封弟灏为昌王，頵为安乐郡王；命韩琦守司空兼侍中，曾公亮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，进封英国公，文彦博为尚书左仆射、检校司徒兼中书令，富弼改

武宁军节度使，进封郢国公，欧阳修、赵概并加尚书左丞，仍参知政事，陈升之为户部侍郎，吕公弼为刑部侍郎，其余百官都有升迁。

二月一日，神宗初登紫宸殿，朝见群臣，随即册立元妃向氏为皇后。向氏是故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，父亲向经，曾当定国军留后。去年向氏同神宗结婚，封安国夫人。神宗即位时有二十岁，生得隆准龙颜，从小就爱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废寝忘食，英宗经常要派内侍说：“你去看看颍王，喊他出来走动走动，不能整天这样读书。”

他对待生活也非常严肃，对爱好声色和嬉玩的历代皇帝都看不起。他最喜欢的是唐太宗，认为当国君就要像他一样，有所作为。他待人也很有礼貌，侍讲王陶一进来讲学，他每天都要领着兄弟赵灏拜先生，从不间断。性格有些倔强，就是大热天，他也从来不用扇，当颍王时，安国夫人对他说：“这么热的天，殿下为什么不打扇呢？”

他说：“你见农民晒在太阳下种地也打扇吗？”

夫人说：“那是农民嘛！”

他说：“热了我可以坐在阴凉地方，这已经足够了。天下打扇的人毕竟是少数，打着扇就做不出什么事来，我不愿用它。”

很多了解他的大臣，都以为他会成为一个明君。

宰相文彦博奏说：“先帝的陵墓怎么修？”

神宗说：“国家一连遭了两次大丧，公私都已经困竭，应该尽量节俭。仁宗的丧事办得铺张，是先帝胆小避嫌，怕别人指责，不敢裁减。现在就无须避嫌了。”

文彦博问：“该拨多少钱呢？”

神宗说：“这不能我说了算，朕要问百官。”

过了几天，神宗就在迎阳门幄殿召集百官议论这件事。三司请求库存钱 30 万缗助造英宗陵墓，神宗问：“还能少吗？”

侍中韩琦说：“可加不可减，这是祖宗陵墓，有个定规。”

神宗说：“依朕看，一切事要量体裁衣才行。皇帝的陵墓也要依据财政情况，才为合理。现在库存钱币不多，全拿来修个陵墓，万一有边掠和用兵，怎么对付？是不是也学周赧王，向商人出字据借钱来修兵革？”

文彦博说：“不论财用怎样困难，祖宗陵墓是不能降格的。如果不够规格，后代人要唾骂我们君臣无能哩！”

神宗说：“你们认为最近三代人都很有能吗？”

韩琦说：“百多年来，真是国泰民安，百姓都享够太平福了。当初还有征战，太宗皇帝后期以来，国家安如磐石，几代皇帝都是好的。”

神宗说：“先帝在位才三年，朕不忍责备他。真宗和仁宗皇帝那 60 年，多少已像败家子了吧！还是要备加赞扬？”

这几句话说得大臣们瞠目结舌。韩琦是三代辅臣，认为神宗这样说是失礼，而且也间接扫了他们的脸，就说：“陛下言过了。”

神宗问：“这么长的时间，他们创了什么新，立了什么业？”

韩琦说：“自古道创业难，守成更不易，所以历代人都称赞主子当如孙仲谋哩！”

神宗说：“孙仲谋当然可敬。他是三国交兵中，在曹操强弩之下以少胜多者，这怎能同坐守太平，享乐度日相比呢？”

文彦博说：“真宗、仁宗也没有做丧权辱国的事，只能尊仰，不合指疵。”

神宗说：“当臣子的为君主护短是忠吗？你们为什么不效

学魏徵呢？朕以为，真宗和仁宗之所以没有进取，主要也就是缺少净臣。还说没有丧权辱国，前几天向辽邦下个讞告，不是朕还要自称侄孙吗？难道这也是光荣！”

这一回把所有的嘴都封住了，再也没有可狡辩的了。尽管这些老臣自以为是国之干城，被年轻皇帝这一扫，感到不能满不在乎地说话了。三司使韩绛说：“先帝辛劳三年，中途背世，虽无创建，也无过咎，请按仁宗之例，给助修陵墓钱，至于国用紧张，以后开源节俭好了。”

神宗说：“准卿所奏。准的理由在于开源两字，心里有这两个字，朕就信能敛财；专说节俭，朕就不信能敛财。”

就仍把三十万缗钱拨去助修英宗陵墓了。英宗的遗物拿出来，分赐宗室近臣。神宗说：“仁宗御天下三十多年，当时宫里富有，遗物也多。先帝御天下才三年多，所以两人难以相比，但也不能说不给，比仁宗要减少三分之二。”

神宗即位后，胸有大志，很想振作一番，恢复强盛。但眼看着暮气沉沉的这个国家，随时都感到有一股冷气袭人，和他心里热腾腾那股英气，一点也结合不起来。他很想换个新气象。他即位时是早春二月，这季节倒是同他配合上了。他的心情，也像乍暖还寒的气候一样，一头热起来，又一头被无情的事物击冷下去。原以为朝廷人才济济，只要自己能很好选拔利用，不论做什么事，都会迎刃而解的。谁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。英宗死后，他们所争议的不是国家振兴和如何配合新主，解除过去积弊的事情；相反，争的是给不给酒肉啦，分多少遗物啦，如何修陵墓啦！再也没有提说要办点新事情。尤其是那些老臣，不论说一句话，走一步路，做一件事，就像刻板一样，随时随地保持着那副老模样儿，不肯稍改。如果这是受人喜爱的，那倒也好了，可惜的是慢腾腾、文绉绉、缓悠悠、冷

冰冰的，使人难以容忍，真想在后面大喝一声，要让他们带点新意，却也太难了。

神宗深切地知道，要天变地变，首先是要人变才行。如人不变，还谈什么呢？所以，自从即位以来，他一心专注的是人。他要寻找一个生气勃勃，胸有朝气，能使国富民强的人。对于当前执政的几个老臣，他感到有点灰心，以致想到国家财政这样匮乏，不正是终日忙着琐务，丝毫办不出一件新鲜事的这些人干的吗？他们都说是能臣、贤臣、才臣，到底好处在哪里呢？他自己半点也看不出来。

一天，神宗召见他的老师——枢密直学士、礼部郎中、右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王陶说：“天子应该怎样治理国家呢？”

王陶说：“请陛下谨听谏、明赏罚、斥佞人、任正士，开言路以通下情，省民力以劝农桑，先俭素以风天下，限年度以汰冗兵，天下就可以治好了。”

神宗听了，觉得这些都是老生常谈，像他过去在给自己讲学一样，丝毫没有什么新意，觉得太失望了，就问：“眼前朕需要解决的是哪一件呢？”

王陶说：“陛下新即位，臣所说的也就是该办的了。”

神宗问：“这些事先帝在时都办过吗？”

王陶说：“有些办了，有些不深。”

神宗问：“先帝的天下可算治好了？”

王陶说：“治好了！”

神宗想，王陶是有学问的谏官，身兼教职，说了一大通治国之道，但又说先帝的国家治好了，表明他看不出眼前弊政在哪里。对这样的臣子，能图个什么呢？回想读书时，老师是讲得很好的。当太子后，也曾想过，如果哪天自己即了皇位，一定要让王陶来当宰相。这样，国家就会治理好了。谁知自己倒

是当了皇帝，而作为老师的他，和现实对照起来，突然觉得他只有一张嘴，而从他嘴里讲出来的，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，就觉得他不是个真正有才华的人，一下就把他看轻了。

神宗又召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说：“国君应该怎样治国呢？”

司马光是陕州夏县（今属山西）涑水乡人，七岁时就以通《左氏春秋》而闻名。小时同小伴一道在花园里玩，只见一个小朋友失足跌进水瓮里。其他人一见，都吓跑了。司马光急忙拾起一块石头，把瓮打破，瓮里的水全淌出来，就把孩子救出。故司马光又以有智而出名。他读书十分用功，读起书来不知饥渴寒暑，在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，以博学闻名。现在，已有四十九岁了。见神宗问，司马光就答说：“如说终身，要以下三条，一仁、二明、三武。治国也要三条，一官人、二信赏、三必罚。臣过去当谏官，就以这六句献仁宗，以后献英宗，现在献给陛下。平生力学所得，都在其中了。”

尽管司马光说这是最不容易获得的治国之道，而神宗听来，仍觉得平淡无味，就问：“你在谏官任上，有哪几样大的谏诤？”

司马光说：“除在朝堂上评论是非外，臣的主要精力是在修《通鉴》，使帝王从中可以借鉴治国之道。”

神宗说：“你把修好的拿一卷来，让朕过目。”

司马光即刻取来几卷进呈。神宗看后，觉得虽简而详，每一件事的记载都很实际，认为这工作很有意义。神宗问说：“你依据什么？”

司马光说：“历代正史。”

神宗问：“一事多说者呢？”

司马光说：“臣从其实，耳从众。”

神宗说：“单名《通鉴》不好，按照你的意图，最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好了。”

司马光唯唯答应。神宗认为他确实是个人才，在总结历代政权得失上是可以咨询的，就擢为翰林学士。司马光力辞，神宗就说：“古时候的君子，有些是学而不文，有些是文而不学，惟有董仲舒和扬雄，就两样都具备了。你有文学，为什么辞呢？”

司马光辞不受翰林学士，也有他自己的看法。由于神宗在朝堂上公开否认真宗和仁宗的政绩，而贬为是败家子。就觉得这个皇上的书没有读好，重要的礼和孝两个字都不见了，就在看不起之余，还觉得可虑，把他看成是个要闯祸的人，所以有怕接近之感。现在把自己擢升为翰林学士，他反以为是祸，故而谦辞。神宗说后，司马光答道：“臣写不好四六骈文。”

神宗说：“写成两汉诏制就行。而且，你的进士都能高第，而说不能写骈文，这不像话嘛！”

司马光听这口气，有点恼味了，再不敢申辩，就不做声地接受了。神宗又说：“我看你修《资治通鉴》是出力而有成就的，但还要把七岁敲瓮救人的智慧都掏出来，好好把国家治好。”

司马光有感于神宗对他的重望，就诚恳地说：“臣遵旨！”

二月的天气，五鼓上朝，似嫌过早。但神宗是新君，这种制度，他是乐于遵守的。过去因循惯了的老臣们，天亮后才进朝，还要等皇帝到太阳出，以至于日高三丈。现在，他们不得不四鼓多就离开家，打着灯笼进宫。人脸都还辨不清的时候，只要皇宫里的漏滴五更，朝堂上的阴阳钟就响起来了。龙烛一亮，神宗就雄赳赳地坐在九龙椅里。文武百官山呼已毕，神宗就发话说：“文班宰相，武班枢密使，哪一个文臣武将不到，